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及其当代启示

胡靖

(杭州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浙江 杭州 311121)

摘要: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基于系统学习马克思主义学说、回应党的革命事业需求、纠正部分党员干部错误认识等多重动因,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他通过研读《资本论》等经典著作,开展广泛的社会政治经济调查,并结合根据地经济建设实践进行分析探索,不仅推动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有效指导了根据地生产建设和革命事业发展,还为新中国经济工作奠定了理论与实践基础。其所带来的启示在于,应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在总结历史经验中与时俱进推动理论创新,并积极推进方法论革新,从而不断增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对当代经济发展实践的解释力和引领力。

关键词:毛泽东;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中图分类号:A8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7835(2025)05-0017-1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党历来重视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学习、研究、运用”,并高度赞扬“毛泽东同志在新民主主义时期创造性地提出了新民主主义经济纲领,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过程中对发展我国经济提出了独创性的观点”,“这些都是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造性发展”^①。近年来,学界对毛泽东关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思想内容,以及新中国成立后研究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方式方法,进行了诸多有益探讨,但就其在革命战争年代如何开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成果仍显不足。鉴于此,本文拟就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研究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原因、举措及成效进行梳理,以期深化对毛泽东思想形成与发展的理解,为当前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创新,引领时代发展提供现实启发。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研究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原因

在中国革命生死存亡的危急时刻,为完整全面地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提出符合中国国情的正确主张,更好地指导根据地生产建设,毛泽东毅然决定着手研究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学习从事经济工作。

(一)系统学习马克思主义学说的需要

为寻求救国救民之路,青年毛泽东曾广泛接触并研究各种新思潮,其中便包括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俄国十月革命的经验。经过不断寻找、总结和比较,1920年夏天,毛泽东最终确立了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随后更加系统地钻研马克思主义理论。他明确提出:“如果我们党有一百个至二百个系统地而不是零碎地、实际地而不是空洞地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同志,就会大大地提高我们党的战斗力量。”^②毛泽东把系统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视为党员干部必须普遍掌握的看家本领,而作为马克思主义三个重

收稿日期:2025-03-26

作者简介:胡靖(1990—),女,浙江金华人,博士,讲师,主要从事中共党史研究。

①习近平:《不断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求是》2020年第16期。

②《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33页。

要组成部分之一,被列宁视为马克思主义理论“最深刻、最全面、最详尽的证明和运用”^①的政治经济学,自然也受到毛泽东的高度关注。1921年,中共一大通过的第一个决议明确规定:工会组织研究机构应将研究“卡尔·马克思的经济学说”作为一项重要工作内容,并且“研究的成果应定期发表”^②。由此,研究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成为中国共产党人的重要职责。毛泽东更是怀着强烈的责任感,主动肩负起这一学术重任,加强了对相关理论的学习、宣传和阐释。

(二) 党的革命事业呼唤科学理论指引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毛泽东清醒认识到,“经济问题不解决,则社会上一切问题俱不能解决”^③。但当时的经济理论研究相当滞后,党在国内外政治经济方面“所收集的材料还是零碎的”,“研究工作还是没有系统的”^④,“还没有产生一本合乎中国经济发展的实际的、真正科学的理论书”^⑤。中央苏区时期,毛泽东就明确提出:“边界党如不能对经济问题有一个适当的办法,在敌人势力的稳定还有一个比较长的期间的条件下,割据将要遇到很大的困难。这个经济问题的相当的解决,实在值得每个党员注意。”^⑥为此,他决心依据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方法,围绕敌友我三方经济、财政、政治等方面的动态进行详细的研究,“然后引出应有的和必要的结论”^⑦,指导中国革命运动。毛泽东认为,应该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研究中国的政治经济等问题,“对每一问题要根据详细的材料加以具体的分析,然后引出理论性的结论来。这个责任是担在我们的身上”^⑧,体现了高度的理论自觉。

(三) 部分党员干部错误认识有待廓清

20世纪30年代前半期,面对国民党反动派对根据地和红军的“围剿”,在如何认识革命战争和经济建设的关系问题上,党内一度产生较大分歧。全面抗日战争爆发后,日军的疯狂扫荡和国民党的经济封锁致使根据地财政遇到极大困难,但此时仍有不少党员干部在生产方面存在诸多陈旧保守的观点。有的党员不从发展经济去解决财政问题,单纯在财政收支问题上打主意;个别部队、机关、学校不愿积极发展公营经济,或是在发展生产时偏重商业投机,而忽视了农业、工业、运输业等基础产业的建设;少数党员持有一种狭隘观念,不愿对边区以外的抗战部队及其干部提供支持;有的党员将金融问题孤立看待,未能认识到金融在发展经济、保障供给中的流通工具作用;部分党员干部轻视生产工作,不愿做财经工作;等等^⑨。上述观念违背了发展方针,阻碍了根据地建设,而其根源在于未能充分理解彼时革命与战争环境的独特性,未能深入剖析新的发展态势,无法提出新办法以应对挑战。鉴于此,毛泽东特别强调:“须注意使我们的思想完全适合于我们所处的环境,然后才能使我们的工作样样见效,并迅速见效。”^⑩通过加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提高认识,消除党内在经济政策上的分歧,为根据地克服困难奠定了思想和组织基础。

二、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研究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举措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认真研读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著作,在充分理解相关原理基础上,于实践中细心观察,进行了审慎而严谨的研究工作。

①《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428页。

②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一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5—6页。

③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上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103页。

④《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96页。

⑤《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13页。

⑥《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3页。

⑦《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02页。

⑧《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14—815页。

⑨西北五省区编纂领导小组,中央档案馆:《陕甘宁边区抗日民主根据地(文献卷)(下)》,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90年版,第310—311页。

⑩《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15—1016页。

(一) 研读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著作

毛泽东从小酷爱学习,且怀有经济和实业报国之志。1912年,19岁的毛泽东便已在湖南省立图书馆阅读了古典政治经济学经典《原富》(《国富论》)^①,这为其后来研究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打下了基础。成为一名马克思主义者后,毛泽东更加认真地学习马克思主义的“本本”,其中就有不少政治经济学方面的著述。

1. 研读《资本论》

《资本论》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经典著作,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前,其中译本尚未出现,相关思想主要通过一些通俗读物传播。1920年11月8日,毛泽东在湖南《大公报》刊登《文化书社通告好学诸君》,其中提及文化书社经售有《马格斯资本论入门》一书,将之列为“书之重要者”^②。1921年4月,毛泽东作《文化书社社务报告》(第二期),列出书社成立七个月来“内容比较重要些的”书刊在湖南的销量,其中《马格斯资本论入门》位列第二^③。据此推断,素来热爱阅读的毛泽东,极有可能优先阅读了这一马克思主义“畅销书”,初步了解到《资本论》的内容。1938年,郭大力、王亚南翻译的《资本论》第一、二、三卷的首个中文全译本,几经波折在上海正式面世,随后出版社将若干套送往延安。毛泽东在收到该书后进行了细致的阅读,并纠正了原书中的错字和不妥当的标点符号,添补了漏字^④。

经过刻苦用心的研读,毛泽东在撰写文章时,便不自觉地引用其中的内容,表达相关的见解。例如:在《矛盾论》中提到列宁对马克思《资本论》中商品分析的介绍,用于说明“事物发展过程的自始至终的矛盾运动”,并强调“这是研究任何事物发展过程所必须应用的方法”,“中国共产党人必须学会这个方法,才能正确地分析中国革命的历史和现状,并推断革命的将来”^⑤。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亦引用了《资本论》中叙述的研究方法,即“详细地占有材料,加以科学的分析和综合的研究”^⑥。在《关于农村调查》一文中又强调,观察农村要运用马克思写作《资本论》时的分析和综合的方法:“先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的各部分,然后加以综合,得出资本主义运动的规律来。”^⑦在《驳第三次“左”倾路线》一文中则引用了《资本论》中关于“人比蜜蜂不同的地方”的论述,并强调“我们要建筑中国革命这个房屋,也须先有中国革命的图样”^⑧。可以看到,毛泽东此时着重于研究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阐述的方法论,使之具有服务中国革命的工具属性。

2. 研读其他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著作

在战火纷飞的年代,凡是当时能找到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经典著作,毛泽东都进行了认真阅读。例如:毛泽东曾细致研读了列宁所著《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并在其1940年撰写的《新民主主义论》中,引用了该书“帝国主义是垂死的资本主义”的重要论断^⑨。毛泽东还阅读了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并且在1948年撰写的《中国的社会经济形态、阶级关系和人民民主革命》中援引该文观点,据此提出了“中国现阶段的人民民主革命的任务”^⑩。

与此同时,毛泽东还研读了其他马克思主义学者的政治经济学著作。例如:1930年昆仑书店刊印了日本著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河上肇所著《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基础理论》。毛泽东仔细研读该书,并做了批注笔记。在读到该书“分析商品而得的商品两个要素——使用价值及价值”时,对于分析问题必

①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上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13页。

②《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385页。

③中国革命博物馆,湖南省博物馆:《新民学会资料》,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91页。

④中国中共文献研究会:《毛泽东读书集成(第1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276—277页。

⑤《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07—308页。

⑥《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99页。

⑦《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80页。

⑧《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44页。

⑨《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80页。

⑩《毛泽东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58页。

须用抽象力这一论述,感到很是赞同,批注写道:“不能用肉眼看见,必须用抽象力。”^①该书的主要翻译者李达是我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先驱,他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不仅翻译了大量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著作,而且潜心研究经济问题,撰写了多部论著,如1935年出版的《经济学大纲》,系统阐述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毛泽东在延安召开的一次小型座谈会上明确表示,李达寄的这本《经济学大纲》,“我现在已读了三遍半,也准备读它十遍”^②。

毛泽东不仅自己反复研读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著作,还多次提倡全党阅读。1941年9月,中央研究组和高级研究组成立后,毛泽东为领导干部列出学习读本,其中包括河上肇的《经济学大纲》^③。同年12月,《中共中央关于延安在职干部学习的决定》明确将“政治经济学”作为各地在职干部学习的重要理论内容^④。1942年2月,中央政治局通过毛泽东起草修改的《中共中央关于在职干部教育的决定》,特别指出“经济科学以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为理论材料”^⑤。1948年9月,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指令宣传部门研究挑选一些书籍供党员学习,其中专门提到《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和苏联经济学家列昂节夫撰写的《政治经济学》^⑥。1949年3月,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再次强调要向全党宣传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并将上述书目列为干部必读书,“规定在三年之内看一遍到两遍”^⑦。由此,提升了全党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解深度和研究广度,推动了这一学说的大众化进程。

(二)开展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情况调查

毛泽东认为,作为党员干部“一定都要亲身从事社会经济的实际调查,不能单靠书面报告,因为二者是两回事”^⑧。他非常注重深入社会,将实际调查作为学习与研究的基本功,仅土地革命时期,就在井冈山和赣南闽西根据地开展调研活动30余次,撰写调查报告10余篇^⑨。这些调查涵盖国计民生、政权建设、土地问题及其引申出的阶级斗争等多个重要议题,使毛泽东更加全面深刻地了解了中国社会的各个方面。

随着革命地域的扩展,毛泽东逐步认识到,以往的调查存在一个极大的缺点,即“偏于农村而不注意城市,以致许多同志对城市贫民和商业资产阶级这二者的策略始终模糊”^⑩,故在推进农村调查的同时,又开展了城市调查。例如:1940年9月,毛泽东专门组织周恩来、叶剑英、李克农、饶漱石等人,就全国十余省市的地主资产阶级和国民党军官情况进行调查,为科学决策奠定基础^⑪。

在毛泽东看来,“社会经济调查,是为了得到正确的阶级估量,接着定出正确的斗争策略”,因此,他调查所采用的主要方法是“解剖各种社会阶级”,所要得到的结论是“各阶级现在的以及历史的盛衰荣辱的情况”^⑫。他坚持从问题出发、从群众出发、从实际出发,将调查的实际情况作为决定政策的基础,彰显出其研究工作的科学性、人民性和实践性。

1.坚持问题导向

问题意识是毛泽东调查研究发生的原点。1919年,他为问题研究会起草章程时,特将劳动问题、实

①《毛泽东哲学批注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489页。

②《郭化若回忆录》,军事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27—128页。

③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十八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626页。

④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十八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715页。

⑤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十九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150页。

⑥《毛泽东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38页。

⑦《毛泽东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60—261页。

⑧《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7页。

⑨主要有《寻乌调查》《兴国调查》《分田后的富农问题——永新及北路的情形》《东塘等处调查》《赣西南土地分配情形》《江西土地斗争中的错误》《分青和出租问题》《木口村调查》《长冈乡调查》《才溪乡调查》等。

⑩《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4页。

⑪《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98页。

⑫《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3页。

业问题、财政问题、经济问题等71项144个当时中国需要解决的问题列为“问题研究会”的要务,并强调“问题之研究,有须实地调查者,须实地调查之”^①。在进行实地调查时,毛泽东注重预先以问题为导向,结合个人知识储备,明确调查目的。例如:1930年5月,毛泽东进行寻乌社会调查,正是由于其感到关于中国的富农问题,自身还没有全面了解,对于商业状况是完全的门外汉,“因此下大力来做这个调查”^②。

从问题出发,毛泽东构建了一套“发现问题—收集资料—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致思理路。他强调,调查就是解决问题,而解决问题的前提是发现问题。在毛泽东看来,“提出问题,首先就要对于问题即矛盾的两个基本方面加以大略的调查和研究,才能懂得矛盾的性质是什么,这就是发现问题的过程”^③。1926年,毛泽东引导第六届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学生进行农民问题调查时,主持拟定了36个项目,不仅包括抗租减租、农村组织状况、农民观念等农民方面的内容,还涵盖租率、田赋、地主来源、主佃关系等地主方面的条目^④。对矛盾双方所涉及的项目进行细致划分,其调查研究便具备高度的可操作性。进一步而言,毛泽东认为:“要解决问题,还须作系统的周密的调查工作和研究工作,这就是分析的过程。”^⑤在寻乌调查中,毛泽东正是通过多维度分析当地的地理交通、经济、政治以及各阶级的历史和现状,懂得了城市商业情况,掌握了分配土地的各种情况,从而提出了一系列解决富农问题的策略办法。针对具体问题作系统的考察分析,毛泽东的研究成果展现出极强的说服力。

2. 践行群众路线

毛泽东在开展相关调查研究时,坚持走进工农群众之中,同当地干部群众进行直接对话。例如:1927年1月,在湘潭县调研时,于银田寺白庙召开了第一区农协干部和会员大会,随后又专门召开农协干部会议,听取汇报;在衡山县考察时,不仅出席了农民协会组织的群众大会,并在农协所在地召开了调查会,同时还走访了数家商店,详细询问并记录了他们的营业额、捐税、工资、伙食开支、货路来源、供销行情变化等^⑥。1933年11月,在长岗乡调查时,毛泽东还同当地农民群众一起参加劳动,以便“了解乡苏工作和农民生活情况”^⑦。

通过开调查会、实地走访和个别访谈等方式,用心倾听群众的呼声,毛泽东深刻洞察了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更深层次的内涵,吃透情况、把握问题的实质。在此基础上,他将群众的意见上升为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指导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例如:1929年3月,毛泽东到福建长汀,邀请当地各阶层人士参加各种座谈会和调查会,以了解长汀的政治经济情况和风俗民情,进而根据调查情况,开展了打击豪绅地主的活动,制定了各项城市政策,并起草了《告商人及知识分子》等文告^⑧。此举不仅激发了农民群众的革命积极性,还争取到商人和知识分子对党的革命事业的支持。可以看到,毛泽东在调查研究中遵循“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工作路线,通过调研收集群众中分散的意见,加以整合提炼和酝酿讨论,进而形成正确的决策主张,最终引导群众将之转化为自觉的行动。

3. 秉持实事求是

在调查研究中,毛泽东坚持听真话、察实情,力戒主观主义。1929年7月,他在出席中共闽西一大时,发现代表们对本地区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实际情况了解不足,当即提议推迟开会,组织代表们对闽西的政治、党务、土地、物价、洋货侵入、工农业破产等方面进行了详细的调查,为中共闽西一大制定切合实

①《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284页。

②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上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305页。

③《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39页。

④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上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161页。

⑤《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39页。

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上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175—177页。

⑦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上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415页。

⑧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上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266页。

际情况的方针政策做准备^①。经过此类调查,毛泽东得以了解到中国社会的真实情况,从而避免陷入空想和盲动。例如:1930年11月,毛泽东对吉水、吉安境内东塘等处调查后发现,按土地法规定,应以乡为单位进行的土地分配,实际普遍是以村为单位进行的,进而决心改变这种利于富农而不利贫农的分配法^②。

在相关调查中,毛泽东还特别反对盲从脱离实际的教条主义,高度重视发扬理论联系实际的优良学风。1933年11月,毛泽东赴才溪乡针对乡苏政权建设、经济建设等问题进行考察,他没有机械地模仿苏联的苏维埃模式,而是立足才溪乡生产实际,思考在国内革命战争的特定环境下,根据地建设的必要性与可能性问题。此外,毛泽东的求实学风还表现为出实招、办实事。1934年4月,其在长冈乡和才溪乡实地调查的基础上,综合其他地方苏维埃工作情况,作《乡苏怎样工作》一文,为苏维埃基层组织建设提供“活的榜样”,有力指导了中华苏维埃代表大会制度的创立和运转。从毛泽东的相关调查报告可以清晰看到,其所载数据翔实,充分体现了“以事实为依据”的宗旨,为后续开展学理化研究提供了可靠的资料信息,是践行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生动体现。

(三)分析和探索革命根据地经济建设

毛泽东在青年时就认识到,“学皆起于实践问题”^③。在研究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过程中,他始终坚持依托根据地经济建设的具体实践,耐心倾听各方意见,从多方面对现实复杂情况进行分析。

1.搜集根据地经济方面的材料

毛泽东认为,依据边区经济建设实际经手人员收集的各方面确实的材料与意见,起草的东西方才更准确,故多次要求工作人员为其提供相关材料。例如:1941年8月,毛泽东指令陕甘宁边区政府银行行长朱理治撰写了一份关于边区金融情况的报告,仔细阅读后认为该报告“很有些价值”,进而建议边区中央局将之作为“起草财经纲领的参考”^④。1942年12月,毛泽东两次致信陕甘宁边区财政厅长南汉宸,索要关于粮食、税收、贸易、金融等方面的材料。这些材料为毛泽东思考边区经济建设,形成对边区经济发展的独到见解,提供了有益参考。如毛泽东《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一文的工业问题部分,便采用了南汉宸写的被服部分^⑤。此外,毛泽东经常阅读有关边区经济的通讯报道,以此掌握根据地经济发展形势。例如:1945年2月,毛泽东先后阅读了报载《贯彻减租》社论、路家口村检查减租的新闻以及张平凯作《晋察冀机关部队大生产的第一年》报道,给予了高度评价,并特别要求广播相关文章^⑥。毛泽东研读一手材料的习惯,深化了其对边区经济建设现实的认知。

2.向经济部门负责人请教

在毛泽东看来,研究活动需要不同思想的碰撞与交流,因此,他频繁地与陕甘宁边区政府、中共中央西北局、八路军后勤部领导以及经济部门负责人,如林伯渠、谢觉哉、李富春、陈正人、叶季壮等,就边区经济建设议题展开探讨。例如:1941年8月6日,毛泽东特致信陕甘宁边区政府秘书长谢觉哉,表明近期“对边区财经问题的研究颇感兴趣”,进而阐述了感想,并谦逊地表示:“提出如上论点,就正于你及林老。如你及林老觉得有错误,即祈毫不客气,一一指正,以归一是。”^⑦3日后,毛泽东又致信谢觉哉,约谈财政经济问题^⑧。8月22日,毛泽东在致谢觉哉的信中提出“经济建设一项乃是其他各项的中心”^⑨的主张,构成了毛泽东关于根据地经济建设的核心思想,丰富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内涵。可见,正

①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上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280页。

②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上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322页。

③《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88页。

④《毛泽东书信选集》,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66页。

⑤《毛泽东书信选集》,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88页。

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中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580页。

⑦《毛泽东书信选集》,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59—160页。

⑧《毛泽东书信选集》,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62页。

⑨《毛泽东书信选集》,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68页。

是通过不断交换意见,毛泽东拓展了自身认识,这也促使他决心下更大力气来研究边区的经济问题。

3. 不断总结经济建设实践经验

毛泽东强调,“一切真知都是从直接经验发源的”^①,而“善于总结经验,就是领导者的任务”^②。1927年中共八七会议上,毛泽东便对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进行了深刻总结,并对农村经济、土地关系、农民运动展开了科学分析,进而确定了党领导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的总方针。随着革命新道路的开辟,党领导下的根据地逐步增多,毛泽东进一步反思了各根据地的土地问题。1942年1月,他“在详细研究各地经验之后,特将我党土地政策作一总结”,领导制定了《中共中央关于抗日根据地土地政策的决定》。毛泽东特别指出,“这一决定是第一次公开承认资本主义生产并给予奖励”,“土地政策,研究了好几个月了,是我党以前未曾有过的决定”^③。这一时期,毛泽东还结合抗日根据地财政经济工作和生产建设工作实践,真学真用,撰写了《开展根据地的减租、生产和拥政爱民运动》《必须学会做经济工作》《游击区也能够进行生产》《论军队生产自给,兼论整风和生产两大运动的重要性》等论著,对大生产运动的基本方针政策作了系统阐述与归纳,表达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认识与实践“具体的历史的统一”。

4. 同错误观点展开辩论与批判

毛泽东具有极强的批判思维能力,通过与当时涌现的若干错误思潮辩论,逐步构建起自身独到的理论体系。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毛泽东就批评了那些认为在革命战争环境下无法开展经济建设,必须等到战争彻底胜利、和平稳定环境确立后才能着手经济建设的论调,以及希望离开革命战争而单纯进行经济建设的观点,他论证了“经济建设工作在革命战争中的重要性”,并主张“经济建设必须是环绕着革命战争这个中心任务”^④。全面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又同诸多陈旧保守观点展开了辩论。例如:针对人民负担问题,毛泽东驳斥了那种不顾战争需要,单纯强调政府应施“仁政”的错误观点,痛斥了不注意动员和帮助人民发展生产,一味向人民索取的错误作风。同时,毛泽东还否决了有些同志不顾此时此地的具体条件而提出的一些做法,如建设重工业,大盐业计划、大军工计划等,认为这“都是不切实际的,不能采用的”。可以看到,毛泽东既反对陈旧的保守的观点,也反对空洞的不切实际的大计划,将之视为“党在财政经济工作中的两条战线上的斗争”^⑤。

三、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研究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成效

通过认真研究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理论,使之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毛泽东提出了适应时代和国情的新民主主义经济纲领,有效指导根据地克服了严重经济困难,为中国革命走向胜利奠定了物质和群众基础。

(一) 开辟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道路

在相关研究中,毛泽东不断深化认识与实践的双向互动,推进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的合理接受和对中国经济社会实际的准确把握,进而对关乎中国革命前途和命运的关键问题作出了深刻的解答,开辟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道路。

具体而言,这一时期,毛泽东研究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结晶,集中体现为“新民主主义经济纲领”。毛泽东运用马克思主义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基本原理,以中国特有的新民主主义生产方式为研究对象,提出了适应中国社会性质和基本经济国情的一系列经济主张和奋斗目标。1947年,在《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报告中,他明确提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三大经济纲领:“没收封建阶级的土地

①《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88页。

②《毛泽东书信选集》,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68页。

③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中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358—359页。

④《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20—123页。

⑤《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93—894页。

归农民所有,没收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陈立夫为首的垄断资本归新民主主义的国家所有,保护民族工商业。”^①从中可以看出中国共产党对待资本主义经济成分的策略,既继承了马克思有关东方落后国家可以“吸取资本主义制度所取得的一切积极成果”^②的有益思想,又结合了中国革命统一战线和解决工农基本经济问题的现实需求,开创了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推进社会经济制度变革的新途径。正如毛泽东所言,这是“我们共产党人根据自己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③,彰显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中国的强大生命力。

(二) 推动了革命事业和根据地生产建设的发展

通过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对中国社会各阶级政治经济状况进行深入调查研究,毛泽东形成了对我国经济结构特征及其本质属性的深刻理解和把握,据此明确了旧中国的社会性质,即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提出了中国革命的任务,即反帝反封建;确定了革命的领导阶级是工人阶级,主要依靠力量是革命中最广大最坚决的同盟军农民。毛泽东还区分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的地位和性质,找到了革命需要团结的力量和斗争的对象。基于对中国社会形态和阶级状况的科学研判,毛泽东为中国革命指明了正确道路与方向,进而促进了革命事业的蓬勃发展。

与此同时,毛泽东在充分理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础上,提出了“发展经济,保障供给”^④的财经工作总方针,大力推进农业生产和其他生产事业,发展公营和民营经济,实行精兵简政等政策。在这些方针政策指导下,根据地的工农业生产效能与经济自给能力得到显著提升,不仅成功创办了许多工厂、运输队及商店,保障了供给,积累了资本,还改善了人民生活,极大地激发了群众参与革命斗争的积极性。贺龙对此评价道:“这是马列主义经济学在边区的具体运用,是活的马列主义经济学(不是能读资本论不懂边币的经济学)。”^⑤毛泽东也自信感慨:“我们学得了经营经济事业的经验,这是不能拿数目字来计算的无价之宝。”^⑥

(三) 为新中国经济工作奠定了理论与实践基础

毛泽东在探究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过程中,展现出显著的先进特质与前瞻视野。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就认识到,“要中国的民族独立有巩固的保障,就必须工业化。我们共产党是要努力于中国的工业化的”^⑦,“中国社会的进步将主要依靠工业的发展”^⑧。他强调:“没有独立、自由、民主和统一,不可能建设真正大规模的工业。没有工业,便没有巩固的国防,便没有人民的福利,便没有国家的富强。”^⑨这些论断对后来新中国作出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决策,具有深远的指导意义。

在革命逐步走向胜利、中国共产党即将取得全国执政地位之际,毛泽东进一步思考谋划了未来党对新中国经济工作的领导问题。一方面,他于全国胜利前夕,带领全党重新学习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新中国成立后国民经济快速恢复作了思想准备。邓小平曾对此高度评价:“那一次我们学得不坏,进城以后,很快恢复了经济,成功地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⑩另一方面,他审慎分析了新中国的经济构成,据此明确了党对国民经济的指导方针,即“必须紧紧地追随着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这个总目标”^⑪。毛泽东还从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的一个阶段着眼,立足国内社会关系

①《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253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479页。

③《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60页。

④《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91页。

⑤西北五省区编纂领导小组,中央档案馆:《陕甘宁边区抗日民主根据地(文献卷)(下)》,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90年版,第307页。

⑥《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466页。

⑦《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46页。

⑧《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83页。

⑨《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80页。

⑩《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53页。

⑪《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256页。

分析矛盾,阐释了新民主主义经济未来向社会主义发展的方向。这为毛泽东在几年后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提供了理论依据,为新中国经济建设的理论与实践创新奠定了基础。

四、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研究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启示

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研究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过程,不仅是其思想升华的过程,也是其破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这一理论对接实践难题的历史过程,对回答好新征程上我国经济发展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一) 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不断开辟新境界

在毛泽东看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充分体现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著作里,因而他非常重视读原著、悟原理。但他同时强调,要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原则,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来“研究中国经济的特点”^①。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不仅从理论上阐释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新路径,而且在实践中身体力行地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创造了合乎中国需要的理论,对成功指导中国革命起到了关键作用。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评价:“毛泽东同志用马克思主义之‘矢’射中国具体实际之‘的’的伟大实践,为我们正确对待马克思主义、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提供了光辉典范。”^②党的十八大以来,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国经济遇到许多新情况,呈现诸多新特点。为此,要高度重视对我国经济发展现状的研究,正确认识和科学判断我国经济工作所处的历史方位和具体发展阶段,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分析当代中国经济的实际问题,构建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形成具有鲜明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政治经济学理论。

(二) 总结历史经验,与时俱进推动理论创新

“政治经济学本质上是一门历史的科学。它所涉及的是历史性的即经常变化的材料。”^③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提出的相关重大判断、理论和观点,正是基于对革命斗争和根据地经济建设的历史过程分析与实践经验总结。毛泽东将发现的规律性认识自觉运用于生产实践和革命斗争,以检验和发展理论,由此推动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不断丰富拓展。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要有生命力,就必须与时俱进。”^④当前,推进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一方面,要发扬党善于总结经验的优势,把中国经济发展的实践经验,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成功经验,上升为系统化的经济学说,“从普遍的存在中找出完全科学的理论”^⑤。另一方面,要面向未来,适应时代要求,聚焦时代任务,回应时代关切,增强对新时代中国经济发展实践的感知和解释能力,深化对新时代以来提出的诸如新质生产力、高质量发展、人类命运共同体等标识性概念的学理阐释,以理论创新引领实践,服务大局。

(三) 积极推进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方法论创新

经济学理论体系的不同首先体现在方法论,经济学的突破与创新往往也首先是其方法论的突破与创新^⑥。延安整风运动期间,毛泽东就特别强调,如果一个人只知背诵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但是完全不能应用,就算不得一个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⑦。为此,他在坚持以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根本方法论的基础上,发展了矛盾分析法、历史分析法、阶级分析法、社会分析法等

①《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98页。

②习近平:《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3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6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53—154页。

④习近平:《不断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求是》2020年第16期。

⑤《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17页。

⑥胡乐明:《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境界》,《马克思主义研究》2021年第8期。

⑦《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14页。

研究方法,着力分析和解决中国革命的诸多现实问题,使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方法论具有更加鲜明的实践性和战斗性。

当前,我国经济正处于由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的新发展阶段,互联网、云计算、人工智能、区块链等先进技术推动着数字经济蓬勃兴起,国民经济由此呈现出诸多新样态。在此背景下,既要坚守唯物史观与唯物辩证法这一主线,将其作为分析我国经济形势、研判未来发展趋向、谋划战略发展方向的基本研究方法,又要紧密围绕数智时代新的生产方式,积极拓展和创新分析方法,建构一套“致用”“实用”“适用”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方法论体系,以指导我国经济更好地适应和引领新常态,实现高质量发展,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使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方法论在新时代更具现实力量。

Mao Zedong's Research on Marxist Political Economy During the New Democratic Revolution and Its Contemporary Implications

HU Jing

(School of Marxism Studies, Hangzhou Normal University, Hangzhou 311121, China)

Abstract: During the period of the New Democratic Revolution, Mao Zedong conducted in-depth research on Marxist political economy based on multiple motivations, including systematic study of Marxist theory, responding to the demands of the Party's revolution cause, and correcting erroneous perceptions among some Party members and cadres. Through studying classical works such as *The Capital*, conducting extensive socio-political-economic investigations, and analyzing and exploring based on the economic construction practices in the base areas, his research achieved remarkable results. It not only promoted the sinicization of Marxist political economy, but also effectively guided production, construction and revolutionary development in the base areas, laying a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foundation for the economic work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The inspiration it brings is that we should adhere to combining the basic principles of Marxism with China's specific reality, promote theoretical innovation in keeping with the times in summarizing historical experience, and actively promote the innovation of methodology, so as to continuously enhance the explanatory power and guiding power of Marxist political economy for the practice of contemporary economic development.

Key words: New Democratic Revolution period; Mao Zedong; Marxist political economy

(责任校对 唐尧)